

·理论探索·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与启示

张小飞,李贇钰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看家本领,是贯穿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土地革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革命运动,强调学哲学用哲学应学思结合、学用结合、学创结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伟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坚持与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强化真理性认识,紧密结合实际,坚持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新篇章。

关键词: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94(2025)06-0103-08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从高潮转向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削弱,中国革命深陷低谷。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开创出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为当代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与启示。

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发生逻辑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陷国民党反革命的暴力镇压,出现了思想动摇和“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冒头的现象,革命形势曾一度陷入低潮。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式、对象、目标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须厘清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运用于革命实践,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张力能够与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成为现代的,体现出深刻的内在逻辑。

(一) 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张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展现出超越以往任何旧哲学的理论张力。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百年传承与经验启示研究”(21XDJ007)。

作者简介: 张小飞,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引文格式: 张小飞,李贇钰.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与启示[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7(06):103-110.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理论的解释力,而且具有实践的推动力。马克思在批判旧哲学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36}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以社会现实为根基,在深刻揭示世界本质的同时,将革命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与行动的科学指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增强了理论的现实针对性,还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思想的批判力,而且具有行动的建设力。恩格斯曾言:“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18}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简单地对旧哲学的否定,而是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哲学,建构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新的解释模式,为人类实践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最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根基具有特殊性,但它能够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特定的西方文化背景,但其所揭示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作用。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解读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秘密,又能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体现出强大的理论张力。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俄国能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靠的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俄国具体实际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走出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敲醒了迷茫不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的希望,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革命运动中所爆发出的实践伟力,他们深切体会到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启迪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进而促使他们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渐渐地使之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眼中的“真权威”“真信仰”,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和行动指南。

(二) 现实基础:革命斗争形势的实际需要

1927年4月,国内革命形势突变,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员超过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超过2.6万名;据1927年11月的统计数据,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3]96-97}。除军事围剿外,蒋介石集团还在全国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对革命书籍刊物严加查禁,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禁学”,企图在军事上与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打压与迫害。在国民党的暴力镇压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只能被迫转到地下秘密进行,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峻风险。

在如此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革命道路产生了分歧甚至错误的认识。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城市斗争受挫以及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是应该继续借鉴俄国革命经验走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抑或是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以王明等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并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只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只言片语,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安排指示,忽视中国革命实际,一度使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遭遇重大挫折。“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本质上是哲学方法论的错误,要消除“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就必须掌握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

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等优越特点,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分析革命形势、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制胜之选。

(三) 文化土壤: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在契合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作为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离不开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契合性。艾思奇指出:“中国自己的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中国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根源。”^{[4]554}梳理中国古代哲学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先哲们的诸多观点——如鼓荡的宇宙精神、丰沛的人文精神、坚韧的实践精神等,本质上都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文化土壤不同,但二者之间却存在可以相互契合的内在属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动”与“变”的精神,体现了对自然运动与发展的深刻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精神高度契合,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文化与心理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革命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特征,能够吸收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秉持包容开放的姿态,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为两者深度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与文化上的内在契合性,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迅速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科学原理,而且还能积极地将其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内容,扬弃了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成分,改造和发挥了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既克服了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朴素和直观的性质,又把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中国哲学历史性、必然性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遇相融,成为毛泽东自身大彻大悟的开始,也是其精神被激励激发的开始。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体系。这不仅在思想层面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认知跃迁,而且在军事斗争、土地政策、群众路线等实践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战略策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也为党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一) 学思结合: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以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等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思想者,在上海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普及运动。他们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为目标,身体力行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据不完全统计,该时

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著作多达113种。《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均在这一阶段完成并出版。这些译著的问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也为中国革命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产生了许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不仅限于翻译和出版著作,还包括开展演讲、集会,创办报刊等,通过学思结合、学辩结合的方式,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与传播度。比如:通过组织学习会,帮助群众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提升革命斗争的能力;通过举办报告会,向广大群众传达当前的革命形势,分析局势利弊;通过召开讨论会,对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进行深入反思,促进军民关系的和谐发展等。这些活动提高了群众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推进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保障。自1935年开始,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等多所干部培训学校先后成立,这些学校大都将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程作为干部的必修课程^[5],系统性提升了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哲学思维素养。同时,党内外知识分子与革命实践者也相继组建了“新哲学学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及“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共同体,以读书会、学术沙龙、理论刊物编纂等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书斋走向战场、从文本走向实践,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构筑起坚实的思想理论阵地。此外,各个中央机构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哲学研习小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造就了一大批哲学理论骨干,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传播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学用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曾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6]796}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原则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学习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

第一,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典型特征。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正确认识并有效指导中国革命,这一艰巨任务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首先明确革命的性质、目标、动力、对象及前途等关键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研、搜集、整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展开系统性研究与分析,强力证明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仅为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而且科学指明了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及革命路径等核心命题,从而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我国早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典型案例。

第二,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消除这些错误倾向带来的影响,毛泽东在1930年所著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

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7]¹¹¹⁻¹¹²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将调查研究视为破除教条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此,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作实际的调查研究,博采和广纳群众之言,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被制定出来,中国共产党人方能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判断与行动策略,从而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8]。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创造性转化为实践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武器,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系统性批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历史性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具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三,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和正确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交汇点上,毛泽东深刻洞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武装斗争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的本质是武装的农民战争”这一科学论断。他强调,唯有建立党直接掌控的革命武装力量,方能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确立并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清晰地意识到,面对强大敌人占领和统治的中心城市,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只能放弃攻打城市,根据我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9]。他果断率领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在井冈山地区构建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武装割据为特征的红色政权体系。这一实践创造性地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历史性统一,更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本质特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陆续提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红色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理论。这些理论学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体现出毛泽东已经能够熟练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进入成熟时期。

(三) 学创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了大量艰苦卓绝的斗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和启示,也遭遇了多次挫折和失败,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正是通过总结与反思这些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应用,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发展,并以此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创新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总结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经验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提出实事求是原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一原则是以批判教条主义为切入点的,毛泽东强调,如果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无法掌握其精髓,更难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实质和要求。二是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观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结合。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分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对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基于对党内思想状况的深刻洞察,撰写了《实践论》这一哲学经典著作,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展开系统性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践导向的思维

方式提供了方法论基石。三是推进唯物辩证法中国化,写出了《矛盾论》。毛泽东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述,反对庸俗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基,深刻批判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这些创新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架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典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

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当代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哲学智慧对于革命实践的引领作用,形成了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仍须赓续学哲学用哲学的“看家本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稳方向,在直面时代课题中破解发展难题,在守正创新中开辟理论新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根本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10]1 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具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1]599。这一科学世界观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他们从科学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实质,从而提高将革命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而要真正实现这一可能,只有立足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性认识,科学掌握进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12]435-436。

今天,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偏差和误区:有的人鼓吹所谓的“过时论”,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现实指导价值;还有人则脱离客观实际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视为僵化的教条,从而导致其理论被“固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10]7“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10]26。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必须以理论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根基,通过体系化阐释彰显其科学真理性的内在逻辑。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复杂图景,需以学术批判的锐度剖析各种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规定的消解企图,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构建起兼具中国气派与时代特征的话语体系。

(二)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实践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贯穿于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指导革命实践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学哲学用哲学都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没有问题导向的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更谈不上对哲学的运用^[13]。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有效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就是始终坚持从问题出发,将学哲学用哲学贯彻到方方面面,从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本领。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的时代坐标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机遇与风险共生、变局与新局并存的深度调整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集中体现为发展效能的区域性差异、供给体系的适配性不足以及民生福祉的普惠性短板。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今天,我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比之前更复杂,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影响面比以前更大。学哲学用哲学,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直面问题的思想方法,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到精准识别、集中发力,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内在需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68]}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立足时代之基、回应时代之问,才能产生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发展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始终在实践中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并不断提出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思想,用以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总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造性实践经验,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思想营养,坚持“两个结合”,做到“六个必须坚持”,把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和看家本领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进程中,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时代转型与话语体系重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实现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科技革命浪潮、全球治理变革等时代课题的学理回应。同时,通过理论通俗化阐释、实践案例转化、大众传播创新等路径,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转化机制,从而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为破解新时代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15]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无论是在革命斗争的严酷岁月,还是在建设发展的崭新时代,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精神引领的旗帜,通过学哲学用哲学来统一思想、指导行动,学哲学用哲学始终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看家本领。在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发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不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智慧,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难题,让学哲学用哲学成为凝聚思想力量的时代新风,在建党百年伟业基础上乘势而上,夺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
- [4]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 王立胜.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于百年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25(05):12-21.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段丽,王永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考察、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11-19.
- [9] 刘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教育刍议[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01):67-73.
- [10]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张维真,魏艳芳.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和启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19(03):21-26.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N].人民日报,2020-01-15(01).

责任编辑:杨春风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Learning and Using Philosophy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Its Inspiration

ZHANG Xiaofei, LI Yunyu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As a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with Marxism as its guiding ideology, learning philosophy and using philosophy is the fine tradition and watchwor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Party's century-long history of struggle.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the CPC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he great power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guiding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revolution, taking th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t philosophy as guidance in revolution, with empha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learning and using, and learning and creating in the study and use of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the CPC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and carry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 of learning philosophy and using philosophy, with emphasis on the tru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close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practice, adherence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write the new chapter of the era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learning and using philosophy